

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

叔永

在目前黨治制度之下，三中全會享有全國政治上無上的大權。可是權與責是對等的。三中全會既對於黨國的大計，擔着左右可否的大權，同時就對於國家的前途，負了不容旁貸的責任。這在平時是如此，在國難嚴重，危急存亡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黨治下的國民，平時對於黨的甚麼大會全會，以為這是君家黨事，與我們沒有甚麼相干，其實棟折榦崩，誰也免不了覆壓的慘痛。我們現在對於行將開會的中全會，陳述一點希望，大約不算十分出位的言論。

談到此次三中全會，不能不使人迴想到一年以來黨事的紛糾與經過。我們似乎還記得在去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以前，曾經有過國民黨的京粵團結會議。這個京粵的代表於十月二十七至十一月七日在上海開了十天的會議。開會的結果，除了解決黨內歷年的紛糾，使中央與廣州非常會議所發生的衝突現象，得用和平方法告一解決外，對於中央政制的改革，也曾經有具體的決議。接着便是十一月十三日南京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大會和

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四屆一中全會。在這個會議中，通過上海會議的中央政制改革案，修改國民政府組織法，選舉統一政府，都是他們的重要工作。而在人的方面，則改選林森為國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為中政會議常務委員。所謂「黨內的和平團結，中央政制的改革」，就算以這幾個人選為點睛的一筆。自然，我們不要忘記，四全大會及四屆一中全會，都是在國難發生後召集的，所以他們的議決案，也少不了一些應時的點綴品。如像所謂國民救國會議，武力收復失地，均會上過議程，得着部分的通過。但是有的是通過而不實行，有的是實行了也沒多大關係，我們此處并無重述的必要。

在上海戰事緊急，國難最為嚴重的時候，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又曾在洛陽開過一次二中全會。但此次可以說是個黨內的國難會議，除了發表宣言及打電徽勉抗日將士外，并無甚麼可記的地方。

以上，單簡說來，便是黨的當局一年來對於國難的勞力與貢獻。我們若把軍事，外交等等重要問題，暫置不論

，而提出「黨」與「政」的關係來做討論的中心，則我們對於此次的三中全會，至少有以下兩個希望。

第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黨的地位與能力，有一個澈底的認識。我們雖於黨的理論，不會有過深切的研究，但是曉得黨以爲國，不是國以爲黨，這是從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出發點看來，應該是不錯的。因此我們以爲三中全會此次開會至少應該有一個反省的機會，反省這一年來所標榜實行的救國設施，是不是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黨的便利暫置不論。單拿一中全會的議決案來說吧。

他們因爲不滿意蔣介石做國府主席，把他推翻了，同時又不能不聯絡實力派，以舉所謂和平團結之實，於是中政會議常務委員三人的設置，而恰恰有蔣，汪，胡三位一體

，來完成這個組織。這在當時看來，是再好沒有的調和方法，可是牠的不能實行，自始即已彰明顯著了。胡漢民自回廣東之後，始終不曾北返。後來蔣介石到漢勸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這樣一來，中政會就形同虛設了。這在平常裝飾品的機關，原來不算甚麼，可是黨治下的中央黨務機關，那能如此。果然，在八月初旬汪精衛與張漢卿決裂，憤而辭職之時，中央黨政機關，竟無一個負責之人。這個事情又恰巧發生在日人尋覓，熱河吃緊的時候，真是

危險萬狀。我記得當時，寄信與南京的一個朋友，說這好像諸葛亮失了街亭之後演的空城計。我的朋友回信說，你說空城計，還是太恭維了，其實只是空城，並沒有計。

說到汪精衛行政院長辭職的問題，更是令人惶惑。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以爲這樣關係政府工作的問題，應該由黨的機關出來三言兩語，短時間內加以解決。但因爲中樞空虛，無人主持，累得元老先生們，南奔廣東，西飛漢口，梭擲不息的鬧了幾十天，纔勉強強得一個結束。這其間，設如國事發生危險，不曉得黨國諸公誰負其責。即使國家幸而沒有發生甚麼大事，但中間政事的耽誤，機會的錯過，又誰能計算他的損失？這豈不是因黨的組織不善而使國家擔受最大的危險嗎？

此次三中全會開會，這個問題當然是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之先，乾乾脆脆攻虛一下本黨的地位和能力。那就是說，國民黨還有組織政府的力量嗎？我們說這個話，自然不是想推卸國民黨，並且現在的國中，也沒有第二個組織可以代替國民黨來組織政府。不過國內團體有沒有力量來代替國民黨是一事，國民黨自己考慮一下對於中國應負的責任又是一事。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才，沒有能力，但是他的大病，在

黨的意志，已不能團結他們的人才，指揮他們的才能。在這個當兒，國民黨還是痛痛快快，承認自己的毛病，做一個根本的解決呢？還是敷衍敷衍，重演一次一中全會的失敗，仍令明知不能合作的三位首領（我說三位首領，不是說他們中間的任何兩人）來支持場面，而讓國事去自尋他的命運呢？這是三中全會應該解決的問題。

第二，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現下的國勢有一個真切的了解。中國現在國勢的危險，是人人知道的，何況黨國的領袖們。不過黨國的領袖們如有真切的了解，便應該對於救亡圖存的方法有一個具體切實的計畫，不應該還拘拘於甚麼軍政調政的時期，五權憲法的門面話，或作徒託空言，大而無當的快意論。我們看見一中全會通過上海會議

的「使政治系統與組織單簡化以增加政治效能」，而同時又主張維持五院制，及會院階級制，不免發生矛盾的感想。我們又看見一中全會有人提議十萬大兵死守錦州，而結果僅得到一個令某將領盡力抵抗的決議，不免對於提案者及議決者的誠意發生疑問。這樣的一派矛盾現象與空言高論，已經把嚴重的困難，弄得嚴重到無可如何的地步了，不知道此次的三中全會，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新的轉機與希望。

我們很慚愧對於黨國最高機關的三中全會，只能發表一點「卑之無甚高論」的議論，但我們至少希望他們能容納這一點逆耳之言。

二十一，十一，二十九

國民黨的內部團結問題

勁扶

國民黨因容共而有左右的紛糾。分共以後，黨的理論方面不復有紛歧的見解，實際方面，政治的方向與主張亦漸歸於統一。但內部的不能團結如故，誠令人不易索解。

在國民黨既握政權以後，因實際政治無何成績表現，在一般人失望聲中，漸漸落到對外自衛不暇之地位。其內部舊

有各派亦漸消失其派系之意識，不復顯示其派系色彩甚濃厚之爭訟。吾人自局外觀察，覺該黨自身之依然未能實現其團結，實由于三數領袖個人間之未能推誠相與耳。

此三數領袖間未能融洽之故，論者謂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為中心而形成黨的惟一的最高勢力。據吾人觀察，殆

不盡然。蓋此三數領袖中，有武人，有文人。武人建立武功，依歷史先例，自必以國政之重心自居，事實上亦非達到實際爲重心之地步不止。況在「軍政時期」，黨的理想固默許軍權高于一切！又有中山先生遺囑明示人以創始新國須賴能建立武功之人！彼文人等，不惟人不期其排艱鉅，創大業，即自己似亦未嘗作超過武人而居黨的最高領袖地位的思想。如此局勢，民國十六七年間本已形成。不幸因武人領袖未釋其時代之疑慮，致文人領袖無法効力于黨國，於是成「反側」之局。復因武人領袖涵容之程度不够，致已在効力之文人領袖無法繼續効力，於是又促成另一「反側」之局。此類「反側」並非起于文人領袖的欲爭最高權，乃由于不見容于武人領袖，不得不出此耳。就觀文人領袖在「反側」之後或「反側」之前，肯在現成狀況之下，居附庸地位而貢獻其能力，此足以證明彼等並無爭霸之心矣。

武人領袖不能容納文人領袖而與之合作，其故殆在武人領袖尚未認識本身已到達實際成爲國政重心之地位，因而仍保存其排拒性。吾人年來習聞造成黨國中心力量之說

矣。今日仍彈此調，且彈得愈高，並有謂應明白宣布現在尚在「軍政時期」，甚至有人倡導組織「藍衫黨」，行法西斯蒂迭克推多制者，此足以表示當今軍事最高領袖之左右親信，仍未認識或不敢自信彼等所期望之中心力量早已成功。現在仍未脫「軍政時期」；此許是事實。年來「黨政」是虛有其名或虛偽的；此也許是事實。然如果重心早已形成，事實是軍權仍高于一切，迭克推多雖無其名早已有其實，而且已成事實早爲各方所默認，則必欲戴上尊號究有何益？

故關於國民黨自身之團結問題，吾人首望已成黨的重心之蔣介石氏能在此次三中全會中懇切表示歡迎全體中委合作，對於憤猶未平之胡漢民氏及其他學委尤宜表示歉意，然後以全會名義，速其來中樞負責，並令其負與其資望及財力相當之責任。黨國要人慣說「精誠團結」，真有「精誠」，斷無不能「團結」之理。吾人爲是言，并非自命爲國民黨排難解紛，不過冀吾國從事政治者，有政治家風度，俾政治道德增高，政治力之運用得以增敏耳。

人才與政治

衡哲

記得十數年前，我們還在外國當學生的時候，大家對於做官的一件事業，都有一種避之若浼的心理。我還記得那時有一位朋友回國，我曾寫信給他，勸他不必到政界裏去。他回信說，「家母也是這樣的意思。我一定不做官，請你放心。」但我們知道，那時正當推翻袁世凱帝制之後，中國在政治上，也正是需要建設人才的時候，爲什麼一般有志的青年，反有這樣的消極態度呢？依我看來，有三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因我們中國的讀書人，向來是以不做官爲清高的；雖然在實際上，做官又是他們讀書的最大目標。其二，是因爲革命後的政界，雖然與亡清的政界站在不同的地位上，但不幸又另有他的昏濁的地方。他不能使那時熱心救國的青年們，加添什麼希望。其三，是因爲那時的青年，都是深深的受過「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的。故在他們的心目中，總仍以爲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

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近十年來，我們眼見因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致使實

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各種的學者，也因生活的不安定，不能安心去研究他們的學問，大家便漸漸覺得從前觀念的錯誤，以爲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中的一個基本條件。於是從前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來了。但談儘管談，實行却又是一件事。因爲談論政治得失之權，固然在我們的自身，實行我們主張的機會，却又不能不有待於當局的意嚮。

這個當局對於一班人才的意嚮，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却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爲友誼的，虛心的，甚至于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於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同時，這些人才或狂于潔身自好的成見，或感于朋友的勸告，或因原來的職務重要，不能分身，遂又常常不能毅然決然的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機會。我對於這些人的清高的人格，以及他們的責任心，除了十分的敬意之外，是沒有第二個意見的；雖然我仍以爲一個真正的人才，也不應該專以消極的態度，來表示他的人格的清高。積極的政治工作，也未嘗不能增加他的人

格。從國家的全體看來，則這個消極的情形，似乎也不應該讓他繼續的存住，因為他是決不能去幫助中國走上政治軌道的。

但上面所說的一班智識界領袖們的困難，也是不容忽視的。比方說吧，此次地質調查所所長翁詠寬先生，被政府任命為教育部部長之後，他的朋友們聽見了，有的便欣慰歡呼，說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可喜之一事。即自民國成立以來，亦為特可紀念之一事。」（見國風半月刊胡先驥先生文）有的却又充分的反對，但反對的理由，却又與贊成者的理由一樣，那便是對於翁先生的學問與人格的愛重。我們學界的老前輩，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葛拉伯（C. G. G.）先生，即是反對翁先生出山的一位。他說道，「做教育部部長的人才，中國也還有幾位，而做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人才，却只有一個，他便是達克托文瀾翁！」我以為這個理由是極有力量的，因為我們一方面固然希望教育部能得到一位有才有學，又有高尚人格者，去做他的部長。而同時，我們也不願眼見國內幾個學者幾十年來所辛苦經營的地質調查所，因翁先生的離去而有陷於沉淪的危險。

凡是與翁先生處在同樣境地的人，若真能覺悟到這個

矛盾情形對於國家前途的危險，而憐然于一味消極不幹的不是根本辦法，則我以為他們至少應該注意到下列的三點。

第一，他們如經知道當局的請求，是出于至誠的，那麼，在相當條件之下，他們便不妨要求一個施行個人政策的絕對自由權。這不是要挾，這是做事與做官的分野。假使當局連這樣一點的自由尚靳而不與，則被徵求的人才們，那時再掉頭不幹，也不為遲。一個人若是不願意單單的去做一個點綴品，無論在自己的良心上，或是從公民的責任上看來，都是無可批評的。

第二，假使當局能同意於上面的條件，而予他們以施行政策的自由，則我以為這正是到了他們施展抱負的黃金機會了。所謂好人政府的實現，豈不正是期待著這樣的一天？我現在再請問我們智識界的領袖們，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諸位還是從容不迫的，以庖丁解牛的手腕與精神，去利用這個機會，以求達到向來所抱負的高遠政策呢？還是措手不及，耳鳴心驚的，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驟然被拋入了大洋之中呢？所以我以為一班智識界的領袖們，對於自己的抱負與政策，在平時都應當有一個預備與修養。這決不是小小的一部一局的政策乃是對於政治及社會全體的

一種烏賊，一個對於國家治病的脈案與藥方。假使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預備，那麼，服務國家的機會來到之後，除了庸庸碌碌的循例去做一個官之外，還有什麼旁的用處呢？這樣，中國的前途還有光明的希望嗎？而所謂智識階級，也就難逃誤國的罪名了。他們平常的危言高論，也就沒有價值可言了。

第三，我以為現在教育界的領袖們，平時還當注意于繼任人才的選擇與培養；俾一旦有更大的責任臨到自身時，自己原來的職事，可以不致繼承無人。這一件事若辦得到，則不但如葛拉伯先生所懷的恐懼可以消滅，並且還可以養成一輩後進的領袖，使有用之才，日益加增。因為一個人是要老廢的，要死的。居於領袖地位的人們，即使不加入政界，又那能跳出老病死的三個範圍？故對於繼任人才的養成，正不必限於做官的預備。不但如此，一位人才

被當局徵求時，不妨再向當局要求這樣的一個條件，便是：繼任自己原來地位的人，必須是由自己推舉的。政府的任命，不過是完成一個形式上的手續；他們絕對不能隨意命令一個人來作爲他的繼任者；即使那個地位是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的。這事初看上去，似乎不免有點把持與要挾的嫌疑，其實不然。因爲一個簡單的、窮苦的、專門的學術機關，是絕對得不到那些志在升官，刮地皮，或是出風頭的新官做的青睞的。猶之紅樓夢上的李執，她是決不會去招引游蜂浪蝶的。故所謂把持與要挾的嫌疑，都可以去管他。何況一個真正的人才，當然還有社會上向來對於他的尊敬與信任？有了這樣一個人格的保障，這樣一個防身的利器，一個人還不好好的去做一點事業，說幾句有斤兩的說話，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蔣廷黻

在社會科學家的眼光裏，中國簡直是個新發現的大陸。發現雖然發現了，開闢則尙待人。無論我們向那方看，政治也好，經濟也好，風俗制度也好，及這些事件的來源

與發展也好——處處是問題，是材料，是一片大處女地。開墾者雖已有人，因爲地方的大，一望簡直看不見了。他們的成績，他們所已開墾的地與未開墾的地相比較不過是如

幾方里和幾百方里相比較。除了一些零星知識外，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生活的各方面是盲目的，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人對於中國的無知而不知，等於喪失土地而不求收復一樣。喪失之罪首在於有守土之責者；這是全國一致的譏諷。

要談社會科學前途的發展，我們首須認清現狀的根由，尤須觀察大學裏的社會科學的現狀。因為無論在那一國，新知識的貢獻是應由大學負其責任之大半的。論到大學裏的社會科學這件事，實不知從那處說起，因為處處都是弊病。第一，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牠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們還不相信新大陸的存在。他們看見英美各國的大學有些什麼社會科學的課程，也就照樣設立這些課程。論課程的多寡，那我們貴國的大學很像堂堂「最高學府」的樣子。論其結果則很可疑。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政治思想的，

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於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於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遍不過看了梁任公的講演集。學經濟思想的，學銀行制度的，學會計的，學經濟史的，學社會史的，學民俗的，那一個不是這樣？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裏為中國造人材，反在這裏為英美法造人材。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倘若變質了，皮膚變白了，外國語說得流暢了，很可以在歐美各國，尤其在美國，作有用的國民。走進中國社會裏去，畢業生好像僑居異邦，社會也不大歡迎。我們年復一年如此過去。教育部長，校長，院長，教授，學生都不以為怪。我們面前的新大陸攔在那裏，不去過問。

有些教育界的人雖然知道了在中國社會科學有個新大陸可開闢，但實際上又發生種種阻礙。一個留學生在國外研究了幾年，假若他是張博士；又假若他在外國的學術成績很好，對於學問絲毫不願虛冒，不願苟且。他在外國所學的雖然很好，仍是外國大學所有的課程。回國以後，這位張博士就到某大學去教書。按這大學的章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程，每星期必須教九點或十點的功課。那末，他只能擔任他在外國所學過的功課。假若張博士是個有智識良心的人，他一定很努力的授課。結果，他對所授的課

程的興趣和心得與年俱進；學生對他也佩服。張博士遂成了一位名教授，全國的大學都想延聘。他對中國的教育確有貢獻，但是他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或歷史的知識則毫無貢獻。平日他也想過作點關於中國的研究，預備將來教一門關於中國的課程，但一動手，問題就多了。假使他的興趣是市政，他一看中國的市政簡直不是市政，換句話說，比他在西洋所學的，所看的，完全不是一樣。或者他因此就想中國的市政值得研究，就中止他的研究了。假若我們這位張博士是個有奮鬥精神的人，也知道研究不能限於完好的事體。上級動物與下級動物，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無」市政的市政與最新式的市政，均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張博士本此精神往前去作。他發現中國的市政學幼稚萬分，既無目錄，又無專門的雜誌。大都市、特別市——雖然發表了幾部報告，都是些官樣文章，連統計都是些官樣統計。至於內地的城市，連這種官場的報告也沒有。同時這位張博士還須在學校擔任三門功課，所以研究的進行也很慢，並且研究與功課發生衝突了。張博士回頭一想：他所授的功課既然有趣，值得他繼續努力，而大學也應該有他所授的功課。對人對己，他大可以種植他的舊園地，無須辛苦的去覓荒。於是他不再開辦中國市政

了。假若這位張博士抱定志向要把中國的市政作一個徹底的研究，他覺得非離開大學去辦一個市政研究所不可。第一個問題是經費。這位張博士的聲名很好，國人都知道他是個市政專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就活動起來，運動政府或中外的基金會或慈善家捐款。他們的運動成功了，研究所也辦起來了。他的困難也從此左右橫生了。為維持研究所的經費，他必須作兩件事，一是出版，一是繼續在外活動。出版要多，他必須多聘研究員，調查員種種幫手。有時捐款的人既限期交卷，又指定題目，而有所指定的題目並非張博士的專長，而張博士在限期內又不能延聘一位專家來幫助他。於是許多出版品不但無新知識的發現，且連調查的正確與否也顧不到了。張博士在研究所裏日夜忙於行政，反無時間研究市政了。建築房子，收買圖書，編預算，造決算，寫報告，延聘人員，接見找事者，疏通董事，推銷出版品，代表研究所出席各種會議，甚至研究所的工友和水電諸雜務都須張博士去照顧。他不但無工夫研究，連看書都沒有時間。新土未開闢，舊園子已經荒蕪了。

如果一位有學術根柢而且有力量的張博士有這樣的經

驗，其他可想而知。市政學如此，其他各種社會科學亦復如此。

爲謀社會科學的發展，我以為我們必須有三種心理的改革。第一，我們應認清開闢新土比種舊園子要難好幾倍。假若一位經濟學者沒有研究過英國的中古經濟，也沒有研究過中國的唐代經濟，而學校忽然要他擔任這兩門課程。那末，英國的中古經濟已經有了不少的專門著作，他可以參看八九種就可以勉強起始授課。至於中國的唐代經濟，以往無專家，幾至全無專著。他要研究必須全從原料下手，而這些原料不但零散，且多不可靠。他非有二三年的專門研究不能起始授課。學校的行政當局絕不能機械式的勉強人人担任三門或四門功課，不問這些功課是新闢的土池，還是舊有的園子。

第二，我們應認清舊園子原先也是荒地，因爲經過若干代人的開闢和種植然後成了舊園子。開闢的工作，不論中外古今都是苦幹。我們不但不可怕苦，且不可眼光過高。我所讀的這部英國中古經濟史當然很好；牠所以這樣好，不但因爲著者是一傑出之人，也是因爲著者之前已有了無數的著者替他開了路，立了根基。我所講的這門中國唐代的經濟誠然是很不完全，但我不講，則後人永無完全的

唐代的經濟史可出世。

第三，我們絕不可迷信一個大學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課程之多；或一個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所學課程之多。大學之大，在乎新開知識疆域之大小。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有無開闢知識疆域的能力。

有了這三種的心理改革，然後可以談辦法。我以為學術工作，不應從行政上下手。換句話說，不應從定條例，籌組織下手。學術工作只能從學者和問題下手。有了一位真正學者，而這位學者對某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有最高的興趣，我們就有了新知識的種子。這個種子是學術界的至寶。學術機關必須負培養的責任。減輕授課時間，減少行政責任，充分的設備，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養這種子所必須的都應該給他。但以利祿來引誘學者是無須的，也是不能有成效的。我所講的培養，專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提倡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種誤會，而這種誤會又容易發生一種流弊。我這種的提倡，並不是要中國人以後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史學。我以為不通西洋政治學的人絕不能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貢獻。其他社會科學亦然。我們必須中西兼顧，然後能得最大的成功。在舊園子

不要荒蕪的條件之下，我望社會科學界的人勇往直前，來開闢這個新大陸。因為這個新大陸是我們的田土，我們不

鄉居雜記

(二)

董時進

因為有上面所說的種種剝削方法，鄉下人確實是十家有九家都弄窮了。許多從先的紳士，現在都自己在田地上操作，自己的田地賣完之後，只好租地耕種，到了沒有資本去種地的一天，就去做散工，賣苦力。（這次給我們抬轎的，便有一個曾經讀過十幾年書。）這是一步一步的被逼往死路走的情形。一個人到了抬轎挑担，一定活不很久，因為那是最勞苦傷身的；抬轎的人，幾乎無一個不抽大煙，無一個有翻身起來的希望。

鄉下關廟，連和尚廟宇，也是遭殃。四川原有許多宏麗的廟宇，但是就我這回所經過的地方說，所有的廟，多半已經傾圮或毀壞，不是天樓地板都被撤去，便是門窗戶壁概不完全。這固然有的是由於駐兵的結果，不過也是因為大家沒錢去修理。我們有一天跑到附近鄉下一個廟子去乘涼，那廟子原來雖不甚宏麗，却是很整潔的。廟的周圍有許多的樹木，和很密的叢林。那知道回一走到，纔令人

大失所望。那廟的房屋既是倚側欲倒，內部尤其腐爛，散爛不堪。背後的林子，稀不遮日，矮的叢林雜草，全被拔光。地上只是石子泥沙，都給水冲起很深的溝漕。這是一個很可慮的現象；河流的淤塞，山坡的荒禿，都是這樣來的。這可說是人們在自掘坟墓而不自知。那天我們買了一些生玉米去交給和尚煮，那和尚無柴燒，臨時拿起一把刀，一個筐子，到林子裡取柴。你道他去取什麼柴？原來林子中，只有若干大松樹，別無柴可取，但是大樹是不能隨便砍的。他原來纔是去修樹幹上的皮。到此時我方明白，為什麼那些樹幹上概有刀劈的痕跡。可憐括盡地皮括樹皮，括盡樹皮又將如何呢？

人民窮，兵士也很苦，四川兵士生活之苦，是大業皆知的。我此次會見一位本家，他曾經在外頭當過六七年兵士和小軍官。據他說，兵都不願意幹，祇是逃不脫。一則監視很嚴，一則是因為路費和衣服的關係不能走路。假使

她出去被捉回來，那就非打個半死不可。並且即使逃開了本軍的駐地，到別處遇着其他的兵隊，也會被盤查出來。

因爲久當兵的人，手上臉上，都容易認辨，一經查出，仍舊要被扣留住再去當兵，不從便要吊打。據他說，他本人想回家已經好幾年，直到這次費了許多事，又由家裏人想法，纔得走脫。現在的隊伍，募兵很不容易，因此當兵的要逃走，愈更困難。

鄉間金融困難，利息自然奇高。大宗放款，概是以田作抵，由放債者收租，名爲穀利。這是有田地的人借債的辦法，其利息約合三分。短期的小借款最普通的利息是五分子下。許多農民，在冬季須借錢去種煙或繳款，借銀一錠，即十四元，至收煙時（約舊曆四月）還二十元，中間約隔五月。但即在舊曆正二月借洋十四元，至收煙時仍須還二十元。又有不放銀而放煙的，此係因債主一時無現款，或不願放出現款，而欲藉放債以脫售存貨之故。普通放法，即以去年實情爲例，放出時期在舊曆十，冬，臘，或正二月，其時煙價每兩在四五角之間，放出作八角計，至舊曆四五月還款，不另算息。不拘在何月放出，煙土作價略同，即借款時間愈短者，利息愈高。

以上均係普通放債情形，並非例外。至於遇緊急需要

沒有奇高的利息。不過此種放款，不如穀利可靠，當有此不能完全收回的。

國民政府限制年利不得過二分的命令，在鄉下也會經貼過告示，但是誰去管他？即是官廳也不過奉行故事，並不會真心去執行。可見改革須從根本上着手，不切實際的法令，徒隨政府的威信罷了。

地方既是民窮財盡，教育自然不會發達。鄉村小學，多半是在破廟的偏角，（好廟好房間要駐兵）地上大概很潮濕，光線雖有很充足的，但多半是因爲沒有牆壁的緣故。普通一個學校有十幾個學生，和一個懶不死的先生。他們在一兩間破房裡，楚囚相對，不知道的，真要當是一個叫化院。縣立的高等小學規模較大，然而也是簡陋不堪。教職員多半是未成熟的青年，不能得鄉民的信仰和尊重。他們穿起短褲，光着腿，赤着腳就可以出來會客。一個人告訴我，縣裏一次開教育討論會，某君起立說：「我們縣裏的教育，真是瞎子牽瞎子，」另一位更正他道：「我說的是娃娃引娃娃。」（即小孩帶小孩）由此可見鄉下教職員是何等人物。所以一般人都不樂意送子弟入學校，他們寧可不教讀書，或送去進私塾。比較有錢的，就會將子弟送到遠方去了。但是所謂娃娃引娃娃，又何只本縣的教育，

近年以來，中國的事體，那件不是這樣。國家大事，省市要差，那處不是一些極幼稚，極膚淺，極缺乏常識與經驗的所謂青年革命家在包辦。即使他們富於熱血，然而事情不是單憑熱血所能辦好的，即使他們有些智識，然而多是不切實際的空理論。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完全被拋棄在一邊，不拿來利用，這真是國家的大損失。

鄉下人送子弟入學的目的，是要他們成「讀書人」要他們在地方上可以站出來說幾句話，到縣衙門可以同知事會面，在鄉下可以使別人畏懼；他們不但要受人欺侮，而且要說的話人家都依從。在鄉下人看來，這纔是教育的用處，至於學什麼職業，他們倒反不重視。即使某種職業真合實用，真可以賺錢，他們也會另用一種眼光去看，不會把他當作教育。鄉下人對於教育的觀念，自然不合現代思潮，並且從一些智識份子的眼裏看來，或許是卑鄙的，虛榮的。不過對於鄉下人說，這却是最切實用的。鄉下人生產非不努力，手藝非不高明，然而他們是終身痛苦，到處受氣，一輩子抬不起頭。在他們想來，手藝再學高明些又怎樣，別人要欺侮起來，還是抵當不住。即使能多找幾個錢，還是要給人家的竹槓敲去。倒不如調皮一些，什麼事不用作，整天在茶館酒館裏混，又有勢力，又有錢拿。

他們好比山林的野羊，不恨身體不再肥些！只恨沒殺利的爪牙。鄉下人的這種觀念固是不好，但這並非鄉下人的錯處，社會的實在情形是如此。

四川向來是一個匪窟，但是近一兩年來，大股的土匪已經少見，因為他們有的當了官，有的打死了。因此綁票的事件也不多於發生，但是小搶還是時常有。這般搶人的，據說不是正式的土匪，多半是以前或現時辦團練的人。他們有的是槍械，到了夜間，三五成羣，七八成隊，出外搶劫。鄉民往往知而不敢報，他們知道這般人不好惹，得罪了他們，有性命的危險。他們可以說你是匪，殺了你纔去報案，或者可以殺了你，說你是被匪殺了。這類事情，在我們的鄉下，曾經發生過好幾次。

不久以前，本地方曾經舉行過戶口調查。不等調查員來到鎮上，地方上已經給他預備好了禮物。調查員一來，將賄賂接濟手來，隨便填一個八百戶或一千戶就了事，連調查的形式也絕對不舉行。後來有一次派款，就以這戶口為標準，於是惹起了紛爭。因為有的地方瞞得多，有的地方瞞得少，瞞得多的地方大家所攤的款輕些，瞞得少的地方攤的重些。擔負重的地方，就起閘了。於是他們要求重新調查，由各鎮互相派人監視（例如調查甲鎮時由乙鎮

派人監視，調查乙鎮由甲鎮監視）但是甲地的情形，乙地人不熟悉，乙地的情形，甲地人也不熟悉，本地人總是可以隱瞞的。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方法，即是以灶為據，有一個灶算一戶。雖說灶未必是與戶完全一致，但灶是不能藏匿的，在無他種可靠的標準之時，到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這次的調查，因為互相有利害關係，挨門挨戶搜查爐灶，總算是認真。但是被調查者，也會有逃避的法子，他們的法子是真不怕麻煩的，即是乾脆把灶挖去，等調查過後再去修造。於是那幾天的灶神，大遭其殃。調查的結果，仍然是有幾層不對。至於鄉下平時報戶口的辦法，即使不漏報，也是幾戶算一戶。我舉一兩家最隣近的本家來說。某家有六個弟兄，年齡最小的已經是五十幾歲，他們多數已經死了，他們的孫已經長成人了，他們分家至少已有三四十年，但是這六個弟兄，至今還是算一家。（實際可以算十幾家）又有一家，兩弟兄已八十餘歲，分家有三四十年，孫輩已經結婚過婚，他們仍然是算一家。這所說的，祇是指調查戶數，並非指調查人數，若是調查人數，那一定是更難真確了。

因此我想到中國的人口確數，恐怕只有天機知道。什麼民政部的調查，內政部的調查，海關的統計，郵局的統計，以及專家的估計，都不過是瞎猜，或者簡直是騙人的，那裏靠得住。大家瞎猜也罷了，還要打筆墨官司，真是無味。反正你也沒有可靠的根據，我也沒有可靠的根據，誰對誰不對，終是沒有法子判決，又爭得出什麼輸贏。也許是大家以為差得遠的，反而差得近，也許是都差十萬八千里。還記得前年美國一位統計學教授，Wilson在太平洋學會裏，說中國人口不到四萬萬，竟惹起許多爭論。其實他又何嘗知道中國人口有多少。他既不知道中國的情形，而且他所根據的也就是你我所根據的，他不過也是瞎猜一下罷了，那值得我們注意。然而因他是一位藍眼睛的人，竟使凡談中國人口的，都要把他的話提一番。這正和談中國農業富源的人，總離不了O. F. B. Park一樣。其實Park又那裏知道中國的情形。他定全是根據紙上的記載，即使他能知道中國的氣候土質，他也不明瞭中國的農業情形，及土地利用的情形。以美國人的眼光判斷中國的事體，畢竟是不會很對的。

中國的學術，概是和講人口問題一樣的。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美術學，以及政治的本身，概是離開實際的。本來真實的學問，應該是由環境發生，但是如今的中國學問，概是外國學術的聯枝。講學的講學，辦政

治的辦政治，都是盲目跟着外國人轉，與本國的事實全不相干。結果學問盡成游談無神實用，政治也是越弄越糟。尤其可惜的是大家的錯誤，自己都不知道。談人口問題的方法，很少人知道中國人口的統計，是如何得來的，調查的方法，究竟應收到如何地步。這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從小就

在城裏，在學校裏或機關裏，很少真去過過民間的生涯，幹民間的事情。即使到鄉間去也往往帶着學校或機關的牌子，並且限於短暫的時間，這樣那能深悉鄉間的真情實況。

(未完)

關中見聞紀要(下)

吉雲

(七) 災害

關中從十七年到現在，旱荒不已。當十七，十八年災情嚴重的時候，除極少數低的地方勉強維持，其餘沒有一個村庄不會餓死人的。地勢越高的地方，餓死人越多。鄠縣岐山，扶風，武功一帶，受災最重；從前一百幾十家的「堡子」，現在只剩了三五家以至十家二十家不等。聽說當時連屍遍地慘不忍視，一直到十九二十年，纔經國內幾個慈善機關雇工掩埋，不過在那裏破屋亂牆底下偶然還看見餓死的枯骨。誰知饑荒還不會耐完，接着又鬧狼災。十八，十九兩年之間，忽然從南山北山來了許多野狼，各縣人毒被害的日有所聞，尤其是小孩子死得最多。到十九年的夏天，費平，寶平，寶區二十多縣，又產生蝗虫，苗木被傷，不計其數。今年七月間又遭雹災，起初在蓮湖發現，以

後漸漸蔓延到關中全部，不問鄉村城鎮，沒有一處不會被「瘟神」光顧。因為他們久經饑荒，身體的抵抗力本就薄弱，一染時疫，十九免不了死。加上缺乏常識，不知預防傳染，如一村有一人患病，不到幾天，全村都傳染起來。所以這次有全家死光了的，全村死去大半的。當虎疫最劇烈的時候，我們剛在那裏旅行，常常看見路旁遺屍被狗噬食，血肉狼藉，臭氣撲鼻。地方官既忙於「逼款」，沒有功夫來理這沒出息的死屍；居民也因爲貧病交加，自己性命且夕不保，更無暇顧到死人。況且自十七年到現在，那裡餓死的人可算常有，屍骨被狗吃的事，早已司空見慣，所以安之若素，不過我們行路的人看見，心內難受罷了。

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在民國十六年以前，老百姓有餘蓄的已屬很少，經過十七，十八兩年大旱，十九年的

難矣，今年的瘟疫，人民相繼死亡的，估計有百幾十萬，幸而餘剩下來，不過苟延殘息。當我們八、九月間在那裏旅行的時候，每天總遇到許多老百姓把這幾年沒有拆完的房料拆下來，運到街上賣柴賣。這種木料拆下來的乾柴，一塊錢可以買三百斤，但是一斗（二十八斤）小麥到要值兩元，所以一間房屋的木料，常常換不到二斗小麥。房子拆了還可以挖黃土洞住，這幾斗小麥吃完，再沒有辦法了。照常例說，農家夏秋二季，無論多窮，總有飯吃的。然而我們這次在郿縣，武功一帶看見斷糧的農村，到處皆是。他們那個時候，靠著渡命的東西，是青高粱。因為今年夏天關中還是很旱，秋糧十有八九乾死，高的地方居民，要想青高粱渡命還不能得，所以聽說，那個時候就有人餓死，今年冬天，更可想而知了。他們家具賣完了賣房子，房子賣完了再沒有東西賣，只好賣兒女。聽某公安局長說「從十七年大旱的時候起，關中十三歲至三十歲的婦女，賣到河東去的，經山西方面調查，有三萬多口。這種人口買賣，在十七、十八兩年之間，完全公開的，現在是半秘密的。」又某建設局長說「這種人口買賣是不能禁止的，因為一家賣出一個女兒，目前她自己的飯碗固然有眷，她的家屬也可以得着十幾元養命；反是，她同她的家

屬總得餓死。」這位建設局長是老於世故的，也許他的話有道理。

官廳對於這垂斃的老百姓，非但不設法救濟，反想出種種苛捐雜稅，在他們身上剝削，其中最剝奪，最殘忍的，要算鴉片捐。聽說陳樹藩做陝西督軍的時候，就提倡種鴉片，抽「烟廠捐」「烟土捐」「烟燈捐」種種名目的捐，飽他的私囊。陳樹藩倒後，繼他握陝西政權的人，雖然督軍，督辦同主席更換了多少次數，鴉片政策，總是很忠實的牢牢守着。經這些督軍，督辦主席的熱心提倡，成績當然是天字第一。凡我經過的地方，儘管買不到飯吃，鴉片煙總可以過癮，真不愧「深入民衆」的四個字。不但成年的男子多吸鴉片，就是婦女小孩也極普通。我們有一次在臨屋縣的尚村，雇了三個人，幫我們取標本，一個四十多歲，一個二十多歲，一個十七八歲。那位二十多歲的工人作了不到一點鐘，因為癮到，放下掘土的鐵鎬，沒精打采的就走了。其餘兩位，勉強支持了三個多鐘頭，把我們要的工作做完，但是也早呵欠連天，鼻涕橫流了。我問那位十七八歲的朋友：「你也吸煙嗎？」他笑而不答，似乎嫌我不識時務。我再說：「你年紀這麼輕，為什麼也吸鴉片呢。」他答：「我們這裡十個人之中，有六七個吸鴉片

，你不要再開了。」我得到這個懇切的答覆，自己覺得有點慚愧果然沒有話再說了。我記得林文忠公說：「煙不禁數十年之後，非但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練之兵」現在看看關中的同胞，這樣窮困萎靡，令人不得不佩服林公的遠見。

大凡有鴉片嗜好的人，總是很懶，不願廉恥。懶是窮的根源，不願廉恥是做盜賊的要素。關中播種粟，既有很長的歷史，吸鴉片的人，又如此其多，就是沒有軍閥摧殘，天災流行，人民也決不會飽暖，地方決不會太平。所以關中的饑荒，表面上看起來，是旱災作祟，事實上還是鴉片造成。因為種粟，所以本地吸鴉片的多。因為吸鴉片的多，所以地方上越弄越窮，土匪越弄越多。因為土匪太多，所以地方一切破產！況且鴉片產量愈多，食糧產量愈少。食糧愈少，市價愈高。市價愈高，儲蓄愈少。加上土匪橫行，道路不通，外邊糧食不能源源接濟，所以一遇到十七年的大旱，惟有束手待斃！從這樣推想下去，鴉片確是關中的禍根！假若不種鴉片，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樣窮，這樣土匪多，餓死這許多人！

關中從前抽「煙畝捐」的辦法，是誰種粟誰出捐不種的不出。這個辦法，比較麻煩，因為在煙苗未熟的時候，必須派員清查，然後纔能徵收。況且這種自由播種的辦

法，農民可種可不種，則「煙款」收入，毫無保障，所以那裡的當局，不得不急念改良。現在的方法比較進步得多了，就是每縣每年派「煙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不種鴉片，派給你的「煙款」你總是要繳的！這種新辦法，對於抽收「煙款」的，確實省了許多手續，得了相當的保障，可算盡善盡美！但是可憐虫的老百姓經這種「法律」一來，要想自己拔出地獄，不種那害人的鴉片，也不得能够了！

「煙款」的派法，各縣多寡不等，例如盩厔縣六十五萬，郿縣三十五萬，鳳翔十四萬，咸陽八萬……。聽說這種派法，是根據民國十三年各縣「煙畝捐」的收入去年減，郿等縣鴉片十分收成，土價也高，除派定額數如期繳足外各縣公安，財政，教育，建設四局，還得充分潤。今年鴉片收成很壞，土價復跌到八毛一兩，雖經各縣政府毒刑「逼款」，派定的額數，一直到我們在那裡的時候，還大多數無法繳足！今年四五月間，郿，鄠等縣農民因無力繳納「派款」，大家會一度齊心赴縣政府繳納農具，表示抵制。後經地方當局，一半勸誘，一半壓迫，風潮纔漸漸平息。農民赤手空拳何能同快槍飛機抵抗！除哀求而外，有什麼別的法呢？哀求儘管哀求，不繳款總是不行的！

「一方無力繳，一方想法逼他繳，『逼款』這雖名詞，就因而產生！」

「逼款」用什麼法子呢？第一步派許多公差到欠款的人家，把他可以變賣的東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將官裏來，先打五百「畫板」，限三天繳款！過三天沒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兩天，限滿沒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鐵，改限一天，如此演進下去！我記得我們從盤屋向西到了一縣，因為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為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鑼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數一，二，三，四，五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殺人罪，不然決不會帶鐵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出「堂上」怒罵，限張三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二十，過限不繳加倍打的一類話，我方纔明白這一班被審的人，不是土匪，盜，賊，是一班無力繳「煙畝捐」的可憐虫，不是訊罪犯，是「逼款」！他們這樣鬧到半夜，纔慢慢沉寂下去，我聽了那種號哭哀求

，悽慘的哽咽，心理上忽然起了一種作用，不知不覺的，一夜也不能睡着，第二天偏又下雨，不能前進，到了晚夜，還是照樣這一套！叫我們腦海裡，又增加不少人間罪惡的印象！後來日子久了，我們走的縣分也漸漸多了，我們眼所看見的，耳朵所聽見的，知道他們「逼款」的情形，各縣差不多一樣！某縣長說：「現在關中做縣長的人，只能稱為晉上司辦捐稅，民政方面談不到」。他又說：「各縣提款的委員，常有三四個坐索，但是我們打人家一百板子，逼不出五毛錢來，就是逼出五毛錢來，還是繳上給人家花，我們何苦作孽，逼死多少沒冤伸的人，真不如拉洋車，一天賺五毛錢，身心俱安的好。」這位縣長是北平朝陽學院畢業，已經做過一任縣大老爺，當我會見他的時候，正是地方住軍向他急迫索餉，他這番議論，在當時也許是從心裡說出來的，不過過了這案餉難關，縣長還是十二分願意做的！

他們這樣「逼款」，經不起毒刑的人，賣房子賣妻女贖命的不少還有的不願意賣妻子同沒有妻子可賣的人，那他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某建設局長告我，在他那一縣，爲「逼款」投井，上吊同直接死於杖下的，他都知道有三十多人；他不知道的，比此數當然還多。又某公安局員告我

，他有一次旁聽提款委員親自「逼款」，那委員向一個可憐蟲說：「你承認明天繳兩元，我今天少打你一千板子！」那個可憐蟲想了一想，啞啞的答道：「明天沒有法子弄出兩元，與其拿不出加倍打，不若今天認了！」岐山，扶風，武功，郿縣一帶的高地，有許多送給人家，都沒有人敢領。因為平常一畝地的糧，稅，雜捐，每年已在兩元以上；再加上「煙畝捐」，則每畝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在普通情形之下，農人的田，是養命之源，在今日的關中，有田反是送命的禍根。有許多農民情願把他的田交出，自求生路，總不可得。因此扶老携幼，秘密逃向南山的，絡繹於途。因為南山裏頭，今年收成好，食糧很有數餘，所以他們總想到那裏繼續他們將斷的生命。他們離家的時候，盤費有限，沿路又無飯可討，只好省吃忍餓！加上婦女腳小，不便行走，每天只能趕二三十里；自他們家鄉岐山，武功等縣到南山，雖算不遠，然而照他們這種速度計算，沒有七八天不能達到。因而他們在半路上就病下來的很多，婦啼子哭，慘不忍聞。這種進又不能，留又不可的地獄生活，我自愧描寫不出。「逼款」逼不出的縣分，也有不少的縣長同民家，把地方困苦情形，稟陳上峯，請與免徵減收的。每次得到批示總是：「該縣所陳全係實情，但官

兵不可以一日無食，所請免徵減收一節，着無庸議」，一類的話來了事；就是說老百姓餓死，逼死不算什麼，官兵沒有飯吃可是了不得。陝西當局既然知道有兵不可以無餉，爲什麼在這老百姓餓死的時候，招兵的旗幟，還到處飄揚呢？聽某秘書長說，陝省正式軍隊有七萬多人，其餘駐紮省內外，歸西安綏靖主任節制的尙不在內。從前中央協餉每月約三十萬，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央協餉即告斷絕，現在餉需完全由陝省自己擔負。以一個窮省，養十萬大兵，要想不逼死老百姓，也不能够。況且西安同華徽廟的兩個兵工廠，也在急急擴充之中，這些地方的經費，動是幾十幾百萬，沒有一點一滴，不是直接或間接從老百姓身上榨出來的，真不愧「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我們根據上邊的事實，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如下：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死亡載道，可算完全由於惡政治造成！所以要想復興關中，非徹底改革政治不可。第一，須把軍隊減少到極低限度，能維持治安爲止。第二，禁絕鴉片，鏟除一切禍根。第三，慎選廉明官吏，招撫流亡，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與民更始。」第四，鑿井開渠，振興農業，修築道路，使漢中陝北的豐富物產，得暢通關

中。辦仿織，煤炭，石油一類的實業，開發利源。如此，人民的困苦，自然會解除，公家的財源也自然會充裕。否

則，若照現在方法辦下去，非弄到同歸於盡不止！

對於「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議（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二十七號裏邊那篇算著，至少有一半話是認錯了目標。此文給了讀者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曰：婁子匡簡直是個愚不可及的傻小子。想「考據」回教禁吃猪肉的「謎」而不讀可蘭經和舊約，已經够傻了；且竟「微引到那種無稽的「小豬八戒」故事」其愚尚可及乎？殊不知婁之記載該故事，完全是受了我要打聽那種故事的影響。靈所引的一經一約，我早在筆記裏引過或提起過，此外

是別有用心？故事起於何時？流行於何地？受了什麼刺激而造故事？故事曾經引起過多少糾紛，增加過民族間多少惡感？我（和婁子匡）所抱的旨趣和所要解決的謎，蓋如是，先生知道嗎？不知道而痛斥婁子匡懶惰愚蠢，可恥可憐，先生大大失言了呢！把經典引給一般社會看，自然很好。婁子匡却早看過了，無須乎勞先生。先生不察，冒冒失失的「扳起面孔來」專教訓他一人，所以我說靈認錯了目標。

我還譯了引了與本問題有關的旁的文籍。我的筆記本非為他而作，雖則北平有一個週刊替我把它們發表以後，他確已讀着。他不至於像靈想像的那麼蠢，以為用這個侮辱回教徒的民間故事，便能打破不吃猪肉的謎。其實他是和我一樣，想知道那般從沒讀過聽說過可蘭經，或雖明知可蘭經而偽為不知的漢人，居然會講出一些什麼故事來講解這個食忌？這種故事有多少？哪些是基於錯誤判斷的？哪些

婁子匡只顧忠實的記載那個故事而沒說一句辯正的話，固然可以說是一種疏忽。但我怕他的文章即使附有辯正語，回教同胞仍未必放他過去。他們決不許人把那個故事，或那種故事寫出來印在紙上，我現在明白了。不過婁子匡並非不知可蘭經裏面，有不少關於食忌之文。上海清真會的董事還說「江紹原」一再施教於婁而婁不悟，先生怎倒斷言他「不肯」讀經呢？恣寫文章之前，為什麼不把

一切有關的文件搜羅齊全，至少粗粗的看一遍？

妻子匡沒有任何開體爲他作後盾，他又不是總長次長

之類的要人。把不經意侮辱了回教以至引起回民反感的罪

名加在他頭上，自然既不至有後患，也不至於喪失政府的

臉；他本人或者也很願意犧牲自己，以維持漢回間的感情

。但是，先生所給他的那不讀經書，妄談考據，擊假當真

，殊屬荒謬的罪名，却完全不能成立。我懇切的希望憲所

代表的知識法庭，把這紹興婁子筐小子即日釋放，放出去

時，無疑應對他說幾句相當的話。

此外我還有四句話要說：（1）北新書局出版的小豬八

戒故事，我沒看見過，所以不談。（2）先生的食忌起源於

衛生經驗說，我認爲很有討論的餘地。（3）先生只感覺到

保護信教自由的必要，而我已感覺到不信教自由之毫無保

障。（4）我這封信正是靠著所說的「挺身而出來自負文字

上的責任，聽候法庭起訴。」所亞勞怒剋，給登出來吧。

順頌 敬安撰識。

汪紹原上言。 二十一，十一，二十二，北平。

敬答江紹原先生

我很感謝江先生的指教。我更感謝他說明婁子匡先生的作文的動機只是「忠實的記載那個故事」和那種故事的影響。我很誠懇的向婁先生道歉。江先生發表的幾篇筆記，我不幸沒有得讀，將來讀了之後若有什麼意見，我也願意寫出來請江先生指教。至於我的食忌起於衛生經驗說，我雖然不否認有討論的餘地，但我的主張是這樣的：（一）回教的食忌是從猶太民族的食忌傳來的，而（二）猶太民族的種種食忌，若把他們排列比較看看，顯然是公衆衛生的戒忌。

胡適。二十一，十一，二十三夜。

外交評論

第一卷第六期

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關於李頓報告書的討論
引：對於報告書之態度……周鯤生
對於報告書之認識如何……吳見吾
國聯調查團之觀察……吳見吾
國聯調查團是否完成其使命……吳見吾

案：所謂「滿洲自治」與九國公約之關係……徐公肅
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王德潤
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王德潤
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王德潤

最近國際形勢之分析……且復
日俄關係之歷史的研究……高宗武
紀念白里安氏……林於譯
一月來之外交與國際政……陶德鈞
外交文件……冷道鈞

定價：大洋四角，郵費在內
半年：大洋二元，郵費在內
全年：大洋四元，郵費在內
零售：每份大洋一角，郵費在內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又一大大貢獻

四部叢刊發售單行本

四部精華希世珍本
任意見選擇無不求不獲

館輯印四部叢刊。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為明清佳刻。出版以來。譽承士林推重。風行遐邇。冠絕一時。願以全書卷帙浩繁。售價較巨。購致非易。於是擇要單行。先後得百數十種。而讀者所嗜不同。取舍各異。此得彼失。猶有遺憾。今春敝館突遭國難。叢刊存書。除有少數於事前運存安全處所外。其餘完全被燬。所留底板。同付劫灰。復業以來。猝難重製。迭承各界垂詢。深懼無以為應。爰就前項運存少數之書提出若干部。化整為零。單行發售。庶讀者任意選擇。無求不獲。其已購全書偶存闕失者。平日補配維艱。藉此得成完璧。各書紙張。分連史毛邊兩種。定價相同。每種存數。多寡不一。以儘數售完為止。另印單行本目錄。詳載書名板本定價。承索即寄。謹此布告。伏祈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啓

贈閱
四部叢刊
單行本目錄

社會調查所出版

米指數公式總論米

是書除敘述指數之意義與指數研究之略史外，對於指數一百數十種公式之來源，得失，優劣，準差問題皆一一加以分析評斷。統計家有言：「吾人今生于指數之時代」。欲研究指數者，誠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米 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米

本書為上海工人二百三十家全年記錄的結果，照目前說來，國內用精密方法，研究勞工的生活費的，這個調查是最大的一個了。我們研究勞工問題，生活費的調查是一個最緊要的步驟，本書用數量的方法樸實的把上海工人生活的各方面表露出來，供社會的觀察和討論，凡欲研究我國勞工生活狀況者，不可不讀。

楊西孟編 定價七角

楊西孟著 定價九角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青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目價報定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八角
「國外」每月一元二角
零售每份四分

編主士英劉

論評書圖

期四第 卷一第

楊端六：中國需要一個圖書分類法
梅汝璈：關於英美法課程的教本
阮毅成：徐謂陽的中國法律淵源兩種
樓桐暉：先秦國際法之遺跡
張維楨：世界大戰所產生的政治影響
高晶齋：關於蘇俄政制的幾本著作
楊及玄：關於三民主義的幾種譯本

零售價格，從第三期起，改為每冊大洋三角。如荷定閱，請直接匯款至南京國立編譯館圖書評論社。郵票（一角以下）代價，十足通用。

鄭鶴聲：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張季同：胡適的新著：淮南王書
何兆亮：凌著實驗法之起源及其發展
倪亮：潘治居理主編的心理學叢書
謝循初：潘敦編的心理學叢書
杜梁周：葛芝教授的普通心理學
鍾梁任：實用物理學的普通心理學
會昭論：有機化學工業（上冊）

平明雜誌

第十五期要目

經濟國家主義的將來
德國政爭的檢討
法蘭西目前的經濟狀況
瀕于沒落的日本資本主義
蘇聯鐵道建設的現狀
法西斯主義的組織理論

李松生 中國農業之產生及其發展
林恒菁 世界論壇（二則）
郭桑垣 大事述評
扶桑 桃花（短篇小說）
朱經業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吳式 黃式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
半年一元二角二分
全年二元二角八分
零售每份四分

出版處：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